

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研究*

肖文超 王雨馨

摘 要：一战后，法国确立了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委任统治期间，在法国当局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影响下，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迅速。叙利亚库尔德人不但组建了政治实体霍伊布联盟，积极推进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以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与基督教名人联合共同发起了以贾兹拉为中心的自治运动。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战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动、法国的民族分治政策、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等因素都密切相关。整个委任统治时期，尽管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实现民族自治的最终诉求，但是这场运动本身培育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战后中东地缘政治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成为现代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重要历史根源。

关键词：委任统治；法国；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肖文超，博士，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郑州大学世界史博士后（信阳 464000）；王雨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21 级世界史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48）。

文章编号：1673-5161(2022)04-0075-2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库尔德斯坦问题’与英国的中东政策研究”（16CSS032）、2021 年度中原英才计划——中原青年拔尖人才（哲学社会科学与文化艺术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重点课题“中东民族问题：历史与现实”（2021-CX-021）的阶段性成果。

叙利亚库尔德问题是指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寻求自治或者独立的问题。长期以来,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作为一个跨界民族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而且对中东地缘政治也产生了影响。从历史根源来看,现代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产生最早源于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复杂的政治、历史与社会背景。^①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动、法国的民族分治政策、土耳其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等因素,均在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委任统治时期叙境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是研究现代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形成过程中无法忽视的关键因素。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研究大多侧重对“阿拉伯之春”以来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现状的考察。^②

① 库尔德民族主义、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明显区别。一方面,传统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源头可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奥比杜拉暴动。现代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都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现代延续。另一方面,一战后随着中东民族国家的独立,传统意义上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具有了国别属性和本土化特征。现代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不仅是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衍生物,而且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因叙利亚本土库尔德部落的融入具备了本土化特征。

② 总体来看,国外相关研究主要围绕 2011 年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罗贾瓦自治”进程、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态度以及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发展等问题展开。参见 Thomas Schmidinger, *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and East Syria: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London: Transnational Press London, 2020; Harriet Allsopp, *The Kurds of Northern Syria: Governance, Diversity and Conflicts*, London: I. B. Tauris, 2019; Michael Gunter, *Out of Nowhere: The Kurds of Syria in Peace an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ed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ran, Iraq, and Syria*, Cham: Springer, 2014; Thomas Schmidinger, *Rojava: Revolution, War and the Future of Syria's Kurds*, London: Pluto Press, 2018; Harriet Allsopp, *The Kurds of Syria: Political Parties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6;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Zeynep Kaya and Matthew Whiting, “Sowing Division: Kurds in the Syrian War,”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4, No. 1, 2017, pp. 79–91; Gary C. Gambill, “The Kurdish Reawakening in Syria,” *Middle East Intelligence Bulletin*, Vol. 6, No. 4, 2004, pp. 1–4; Spyridon Plakoudas, “The Syrian Kurds and the Democratic Union Party: The Outsider in the Syrian War,”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28, No. 1, 2017, pp. 99–116; Aylin Ünver Noi, “The Arab Spring, Its Effects on the Kurds, and the Approaches of Turkey, Iran, Syria, and Iraq on the Kurdish Issue,” *MERIA Journal*, Vol. 16, No. 2, 2012, pp. 15–29。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汪波、穆春唤:《叙利亚库尔德人内战前后的政治发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2 期;肖文超:《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西库尔德斯坦”自治的前景》,载《世界民族》2015 年第 2 期;王琼:《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及其影响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 年第 6 期;汪波:《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党政治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 年第 1 期;王晋:《当前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载《中东研究》2018 年第 2 期。

然而,围绕现代叙利亚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仅乔迪·特吉尔(Jordi Tejel)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历史、政治与社会》、大卫·麦克道威尔(David McDowall)的《库尔德现代史》等学术著作进行过相关论述。^① 本文根据新近出版的相关档案文献并结合现有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对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及演变过程,揭示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的根源,深入分析其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的复杂影响。

一、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叙利亚委任统治地位的确立为理解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及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背景。

(一) 法国对叙利亚委任统治的确立

委任统治制度是一战后列强通过国际联盟对战败国殖民地进行瓜分或者统治的新形式,是掠夺和瓜分殖民地的一种重要手段。^② 一战期间,协约国出于战略考量,将叙利亚和阿拉伯民族问题转移到国际政治舞台。1915年《英俄协定》和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都曾对叙利亚问题提出过相关解决方案。根据协定,法国要求维护叙利亚北部,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传统利益。^③ 1918年奥斯曼当局与协约国签署《穆德洛斯停战协定》(*Mudros Armistice Agreement*)后,叙利亚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1919年6月2日,叙利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承认叙利亚为主权独立国家,拥戴费萨尔为国王,废除《赛克斯—皮科协定》,反对拟议中的委任统治,谴责任何分裂叙利亚的企图,强调不接受法国任何形式的援助。^④ 同时,费萨尔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阿拉伯独立的声明,要求派遣代表前往叙利亚进行民意调查。费萨尔的要求获得了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支持,后者并派遣金-

^①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2021.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委任统治制度不仅在美国受到负面报道,在欧洲也受到负面报道。此外,苏联和美国都不承认《赛克斯—皮科协定》秘密协议的有效性。旧的殖民和受保护国制度只涉及殖民地国家和殖民地双方,而新的委任统治制度则产生了第三个角色,即国际联盟。

^③ Philip Shukry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 1920-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2.

^④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7页。

克伦代表团(King-Crane Commission)参与调查。^① 同年 7 月,代表团报告提出叙利亚可以在委任统治国的监督下实现统一。实际上,这为叙利亚的独立道路蒙上了阴影。1920 年 3 月 7 日,大马士革议会宣布叙利亚独立并拒绝一切外国监护,但遭到英国和法国的拒绝。在没有阿拉伯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协约国最高会议在圣雷莫通过决议,将叙利亚置于委任统治之下。^② 加之此前《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有关规定,法国正式获得了对黎凡特地区的委任统治权。1922 年 7 月 24 日,委任统治宪章正式颁布,明确规定了法国在委任统治期间的主要任务:第一,起草一项法令以支持地方自治;第二,支持用本土语言进行公共教育;第三,确保领土安全并拥有对外事务权;第四,保证外国人的特权、豁免权和无差别待遇。^③ 该宪章的颁布意味着法国在叙利亚委任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

作为委任统治国,法国一方面要服从国际联盟的安排,另一方面要向叙利亚和黎巴嫩派驻高级专员作为法国委任统治的官方代表。高级专员在立法和行政领域享有极大的权力。此外,根据《委任统治法案》第 3 条规定,委任统治当局代表叙利亚政府行使外交权。高级专员直接管理的秘书长和特勤局主要负责法国在委任统治期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④

(二)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地理、人口与社会融入

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主要生活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界附近三个狭长且不连续的飞地——上贾兹拉(Upper Jazira)、贾拉布卢斯(Jarablus)和库尔德山(Kurd Dagh)。^⑤ 这三块飞地被认为是库尔德土地进入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自然延伸区域。^⑥

历史上,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社团主要来源于土耳其、伊拉克的库尔德移民以及自古代以来就生活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据文献记载,自 17 世纪以来,受奥斯曼帝国移民政策的影响,贾拉布卢斯和萨鲁贾等地区就有库尔德人在

^① Stephen H. Longrigg, *Syria and Lebanon Under French Mand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87.

^② Stephen H. Longrigg, *Syria and Lebanon Under French Mandate*, p. 99.

^③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15.

^④ Philip Shukry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 1920-1945*, p. 78

^⑤ Michael M. Gunter, ed., *Routledge Handbook on the Kurds*,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367.

^⑥ 库尔德飞地的产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与土耳其的边界争端密切相关。参见 Benjamin Thomas White, *The Emergence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in French Mandate Syr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01-131。

此生活。贾兹拉地区生活着米利斯 (Millis)、达卡库里 (Dakkuri)、哈萨那 (Hasanan)、米兰斯 (Mirans) 等半游牧和定居的库尔德部落。^①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库尔德人组建的哈米迪耶 (Hamidiye) 骑兵在大马士革军事防御中具有重要地位。奥斯曼政府也在大马士革设置了一些以库尔德人为主体的军事据点。最初,这些库尔德军事据点位于萨鲁贾,后迁移至卡辛山 (Mount Qasiun)。库尔德士兵一方面要维持城市秩序,另一方面负责保护前往麦加的朝觐路线的安全。自 18 世纪开始,沙姆地区 (Bilad al-Sham) 一些库尔德部落曾长期保持与库尔德斯坦部落的传统联系,其他一些库尔德部落则被同化进了阿拉伯部落社会中。^② 一些库尔德名人甚至在叙利亚首都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权力。^③ 20 世纪 30 年代,大马士革城市中 40% 的库尔德人被阿拉伯化,约有 12,000 名库尔德人完全融入城市生活。^④

在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库尔德人口迅速发展。当时,库尔德人口约 25 万,约占叙利亚总人口 (295 万) 的 8.5%,^⑤ 其中,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难民约 22,000 人。^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数以千计的库尔德难民从土耳其和伊拉克涌入贾兹拉,致使当地人口数量随之增长。这些库尔德难民主要来自 1925 年谢赫赛义德 (Shaykh Said) 暴动失败后逃到叙利亚的库尔德人。^⑦ 但 1927 年以前,该地区只有 47 个库尔德村庄。至 1939 年,库尔德人占多数的村庄数量增加到 700~800 个。根据 1939 年叙利亚官方人口普查结果,上贾兹拉地区人口数量达 158,550 人,其中包括 81,450 名库尔德穆斯林和 2,150 名雅兹迪人。^⑧

库尔德人口数量的增加主要受益于法国当局在贾兹拉等地区推行的农业定居化工程项目。这项工程项目主要围绕叙利亚北部的法国军事占领区展开。在

①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10.

② Michael M. Gunter, ed., *Routledge Handbook on the Kurds*, p. 367.

③ 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穆罕默德·库尔德·阿里 (Muhammad Kurd Ali)、叙利亚共产党重要奠基者哈立德·巴克达什 (Khalid Bakdash) 都是属于城市群体的库尔德人。

④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10.

⑤ Ofra Bengio, ed., *Kurdish Awakening: Nation Building in a Fragmented Homelan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4, p. 194

⑥ Abbas Vali, ed.,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California: Mazda Publishers, 2003, p. 192.

⑦ 关于谢赫赛义德暴动,参见 Robert W. Olson, *The Emergence of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the Sheikh Said Rebellion, 1880-1925*,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4.

⑧ Jordi Tejel Gorgas, "The Terrier Pla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Kurdish Policy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 in Syria, 1926-193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urdish Studies*, Vol. 21, No. 1-2, 2007, p. 95.

占领区内,游牧人口的增长带动了库尔德人口的增长。贾兹拉地区的农业发展也带动了商业中心的建立,弥补了当地传统商业市场的缺失。法国当局建立的哈萨卡(Hasaka)与卡米利什(Qamlishi)两个城镇分别成为该地区的行政和经济中心。至 1932 年,随着农业定居工程的推进,除米利斯和米兰斯两个部落仍保留传统季节性游牧活动外,大多数库尔德人都在上贾兹拉定居。^①

身处城市与农村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对是否融入阿拉伯社会看法不一。城市库尔德人主张融入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在贾兹拉等农村地区,库尔德部落并不认同城市库尔德群体的文化价值观。相反,农业定居化进程的推进进一步收紧了部落与土地的联系,强化了他们对库尔德定居点的部落认同。有学者甚至认为“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村库尔德居民几乎没有一点共同之处”^②。除贾巴尔·阿卡德(Jabal Akrad)外,贾兹拉等地区的库尔德人基本都处于与其他族群和宗教群体混居的状态,如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土库曼人、雅兹迪人、基督教信徒和犹太人等。^③族群的杂居和融合加深了各族群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委任统治时期库尔德人生活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等诸多因素都表明,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族群。^④

(三) 叙利亚库尔德人对法国委任统治的态度

1919 年底,法国军队在库尔德山首次接触到了库尔德人。事实上,1920 年法军占领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后,库尔德人内部对法国即将实行委任统治的态度出现了分化。

首先,费萨尔建立的阿拉伯政府对库尔德人采取敌视态度。1918 年至 1920 年,费萨尔及其支持者建立了一个短暂的阿拉伯政府,对库尔德人表现出极大的敌视情绪。这主要源于库尔德人与前奥斯曼政府的紧密联系,以及战时库尔德人的亲奥斯曼立场。1920 年 7 月,费萨尔内阁倒台后,生活在大马士革的城市库尔德人随即向法国效忠。^⑤ 优素福(Al-Yusuf)和沙姆丁(Shemdin)等库尔德家族

^①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ed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ran, Iraq, and Syria*, p. 87.

^② Sebastian Maisel, *The Kurds: An Encyclopedia of Life, Culture, and Society*, California: ABC-CLIO, 2018, p. 279

^③ Wadie Jwaideh,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45.

^④ Michael M. Gunter, ed., *Routledge Handbook on the Kurds*, p. 367.

^⑤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ed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ran, Iraq, and Syria*, p. 86.

从来没有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表现出好感。^① 关键在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生存环境和部落稳定构成了威胁,这成为部分库尔德人支持法国委任统治的重要原因。

其次,土耳其凯末尔主义与泛伊斯兰宣传加剧了叙利亚库尔德部落的内部分化。贾拉布卢斯地区的一些库尔德部落对法国在该地区的占领表达了不同态度。基特坎(Kitkan)部落在法军到达后立即投降,而米利斯(Millis)选择在乌尔法地区与法国当局合作。一些库尔德部落支持叙利亚阿拉伯独立运动。^② 另一些部落受到泛伊斯兰宣传的影响,先后加入土耳其阵营,在马拉什(Marash)、安泰普(Antep)和乌尔法附近阻击法军。1926年,因亲土耳其势力对库尔德和阿拉伯部落的鼓动和宣传,法军在上贾兹拉地区遭遇了强大的军事阻力。^③

最后,叙利亚境内城市与农村库尔德人对法国委任统治的态度也表现出明显不同。城市库尔德人更倾向于支持法国的委任统治;农村库尔德人基于对部落和宗教信仰的忠诚,加之凯末尔主义与泛伊斯兰宣传的影响,对法国的委任统治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状态。但是,随着法国委任统治的确立,以部落忠诚和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传统库尔德认同难以阻止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孕育和发展。相反,部落和宗教力量在现代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甚至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霍伊布联盟的组建及其早期民族主义实践

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勃兴与霍伊布联盟(Khoybun League)的组建及其早期民族主义活动密切相关。

(一) 霍伊布联盟的组建与民族主义话语

霍伊布联盟的组建与土耳其库尔德部落领导人谢赫赛义德的武装暴动密切相关。^④ 1925年,谢赫赛义德暴动失败后,作为清除库尔德激进势力的一种手段,

^①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11-12.

^② 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Syria: The Forgotten Peopl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28.

^③ Jordi Tejel Gorgas, "The Kurdish Cultural Movement in Mandatory Syria and Lebanon: An Unfinished Project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1932-46," *Iranian Studies*, Vol. 47, No. 5, 2014, pp. 843-844.

^④ FO 371/10867, R. C. Lindsay to Austen Chamberlain, *Foreign Secretary*, April 22, 1925, No. 322, 转引自 Anita L. P. Burdett, ed., *Records of the Kurds: Territory, Revolt and Nationalism, 1831-1979, Volume 6: 1921-1927*, Cambridge: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 2015, pp. 478-479.

土耳其政府计划将库尔德部落驱逐到该国西部。为躲避土耳其政府的迫害和追捕,大批库尔德名人、地主和武装暴动者逃往叙利亚北方地区寻求法国当局的保护,并很快融入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① 尽管流亡在叙利亚,他们反对土耳其的政治目标却始终没有改变。1927 年 10 月 5 日,部分库尔德知识分子、前军官、酋长和部落领袖等在黎巴嫩贝鲁特成立了第一个反对土耳其的泛库尔德独立运动全国性组织——霍伊布联盟。^② 除在贝鲁特设立中央委员会外,霍伊布联盟还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哈萨卡以及境外伊拉克、土耳其、开罗、巴黎都设立了分支机构。^③

霍伊布联盟的创始成员主要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难民,人数约 100 人,由贾拉达特·贝迪尔汗(Jaladat Badirkha)担任首任主席。^④ 梅姆杜赫·塞利姆(Memduh Selim)、伊赫桑·努里(Ihsan Nouri)和贝迪尔汗(Bedirkhan)兄弟等都是土耳其库尔德难民的代表。^⑤ 卡普特(Karput)、比特利斯(Bitlis)、博坦(Botan)等地区是这些组织成员的主要来源地。贾兹拉和大马士革是接收库尔德难民最多的地区。除 1937 年抵达叙利亚的努里·德西米(Nuri Dersimi)以外,霍伊布联盟中没有阿拉维派库尔德人。

霍伊布联盟在组织纲领提出了几大目标:第一,继续与土耳其政府作战,并在土耳其领土上建立一个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中心;第二,与亚美尼亚人合作;第三,拒绝服从卡利法特游击队(Califat Partisans);第四,与苏联、波斯和伊拉克建立友好关系以保持中立;第五,寻求英、法等大国的支持。^⑥ 尽管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凯末尔政权,但是它并没有挑战法国在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地位。根据分而治之的策略,法国当局甚至允许霍伊布联盟在叙利亚境内组织聚会和动员

①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ed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ran, Iraq, and Syria*, p. 87.

② Emel Elif Tugdar and Serhun Al, eds., *Comparative Kurdish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Actors, Ideas, and Interes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30.

③ Abbas Vali, ed.,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p. 197. 关于该协会的组织结构、内部管理与运作等具体详情,参见 AIR 23/413, Translation of a Pamphlet, “The Khoybun Society: The Kurdish Race and Country,” 转引自 Anita L. P. Burdett, ed., *Records of the Kurds: Territory, Revolt and Nationalism, 1831–1979, Volume 7: 1927–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 2015, pp. 257–260.

④ AIR 23/413, Memorandum, Minute by Air Intelligence, Baghdad, “The Khoybun Society,” May 11, 1928, 转引自 Anita L. P. Burdett, ed., *Records of the Kurds: Territory, Revolt and Nationalism, 1831–1979, Volume 7: 1927–1930*, p. 116.

⑤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144.

⑥ Ibid., p. 19.

以对抗与土耳其。^① 根据档案记载,法国当局为霍伊布联盟的成立提供了大量资助。^② 库尔德专家瓦迪·吉瓦德(Wadie Jwaideh)认为霍伊布联盟的建立为密切法国当局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合作奠定了基础。^③

从意识形态来看,霍伊布联盟代表了一种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和传统库尔德部落代表之间的不自然联姻。它是该组织内部一批接受过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前奥斯曼帝国军官、阿迦(Agha)与谢赫等库尔德部落领导人共同制定的一种全新的库尔德民族话语体系,旨在反对凯末尔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话语。凯末尔主义者宣称库尔德民族主义是反动和抵制文明的,他们甚至声称要将文明带到库尔德斯坦。但是,霍伊布联盟领导人认为库尔德知识分子必须反击土耳其民族主义言论,向世界证明库尔德人才是文明世界的重要成员,而不是土耳其人,强调库尔德人是凯末尔政权的真正受害者。^④ 霍伊布联盟领导人进一步表示,要以阿拉伯知识分子为榜样,带领库尔德人走向西方文明,并宣称库尔德社会必须从上到下实现现代化。

需要强调的是,霍伊布联盟尽管是一个政治组织,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独立立场。相反,在整个委任统治期间,霍伊布联盟仍坚守共同的文化认同理念,努力使自霍伊布联盟构建的库尔德民族话语适应传统库尔德部落社会代表的心态,力图阻止传统部落社会内部的矛盾与纷争,以更好地培育库尔德民族共同体意识。霍伊布联盟提出的对库尔德事业忠诚的誓词即是民族精神适应部落环境的明证。该誓词中提到:

“我在此以我的荣誉和宗教发誓,自我签署这份为期两年的承诺之日起,我不会对任何库尔德人使用武力,除非他攻击我的生命和荣誉,或者攻击我家人的安全和荣誉以及违背民族大义。我将把所有的血仇和其他争端推迟到两年后,并尽我最大的努力防止两个库尔德人在私人事务上发生流血事件。任何试图违反这项承诺的库尔德人都被视为叛国者,处决每一个叛国者都是我们的义务。”^⑤

①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 454.

② AIR 23/413, Memorandum, Special Service Office at Sulaimani to Air Staff Intelligence, *Air Headquarters*, Baghdad, March 31, 1928, 转引自 Anita L. P. Burdett, ed., *Records of the Kurds: Territory, Revolt and Nationalism, 1831-1979, Volume 7: 1927-1930*, p. 100.

③ Wadie Jwaideh,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145-146.

④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19.

⑤ AIR23/416, Periodical Report from Special Service Officer at Mosul to Air Staff Intelligence, *Air Headquarters*, Hinaidi, February 26, 1930, No. I/M/42, 转引自 Anita L. P. Burdett, ed., *Records of the Kurds: Territory, Revolt and Nationalism, 1831-1979, Volume 7: 1927-1930*, p. 627.

(二) 霍伊布联盟的民族主义活动

霍伊布联盟在教育、外交、政治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民族主义活动。

第一,开展民族主义宣传与教育。在叙利亚北部以及包括阿勒颇、大马士革以及贝鲁特在内的主要城市,霍伊布联盟不仅创办了大量库尔德语学校,而且推进各种库尔德委员会和协会的创建。为扩大组织影响力,霍伊布联盟还在苏莱曼尼亚和巴格达等城市建立分支机构。在开展库尔德民族主义宣传过程中,霍伊布联盟领导人贝迪尔汗家族的贾拉达特与卡姆兰(Kamuran)兄弟在推进库曼吉方言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随着霍伊布联盟民族主义话语的推广与传播,库尔德地区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加入霍伊布联盟。叙利亚库尔德人不仅将霍伊布联盟组织视作一个学习新知识、接触新思想的中心,还称其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学校”。^①一些库尔德作家、诗人和哲学家等知识分子积极参与霍伊布联盟发起的活动。^②通过加入霍伊布联盟,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知识分子不仅获得了民族斗争的最宝贵经验,而且更广泛地接触到了关于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权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这些都为真正意义上的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③

第二,进行隐蔽外交活动,寻求大国支持。^④根据组织纲领,霍伊布联盟成立后,除注重文化宣传之外,同时也积极开展隐蔽外交活动,为库尔德人未来的事业寻求大国或者地区盟友支持。霍伊布联盟希望建立外交联系的国家不仅包括英、法、美等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包括当时的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甚至还包括共产主义国家苏联。^⑤此外,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反对派等非国家行为体也是霍伊布联盟进行外交接触的对象。霍伊布联盟并不关心相关国家所宣称的意识形态,而是寻求政治或军事支持。霍伊布联盟建立这些外交联系基本上都是通过非官方的秘密渠道进行的。

二战期间,随着法国在黎凡特地区影响力的下降,霍伊布联盟认为构建与轴心国的联系对库尔德人最为有利。德国驻叙利亚专员冯·亨提格(W. O. Von Hentig)与哈利勒·本·易卜拉欣(Khalil Ibn Ibrahim)帕夏和卡姆兰·贝迪尔汗

①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17.

② 肖文超:《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西库尔德斯坦”自治的前景》,第 58 页。

③ 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Syria: The Forgotten People*, p. 29.

④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ed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ran, Iraq, and Syria*, p. 87.

⑤ Ahmet Serdar Akturk, *Imagining Kurdish Identity in Mandatory Syria: Finding a Nation in Exil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p. 65-66.

进行秘密接触。德国希望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人达成和解并保证二战后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的独立,条件是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必须服从其指示并在土耳其制造麻烦。^①然而,德军在苏德战场的溃败以及英国对库尔德人的宣传效应最终迫使霍伊布联盟切断了与德国的联系,转而调和与自由法国的关系,并希望与英国结盟。尽管英国方面也向霍伊布联盟表示会支持后者建立一个库尔德自治实体,但是英国的犹豫不决以及模糊性立场最终使叙利亚库尔德领导人不得不进一步转向苏联。1944年,苏联也加强了针对库尔德人的宣传。苏联甚至宣称它是库尔德人未来的解放者。莫洛托夫甚至以苏联政府的名义承诺在外交上支持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②但是,二战期间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很快就覆灭了叙利亚库尔德人与苏联最终达成协议的一切希望。

霍伊布联盟寻求大国支持的诸多努力非但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效,反而暴露了新旧两代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严重分歧。与老一代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完全寄希望于大国的支持相比,新一代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更希望以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为榜样。当然,这与新一代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受到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话语的影响密切相关。

第三,领导土耳其阿拉特山库尔德暴动。霍伊布联盟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叙利亚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霍伊布联盟为扩大影响力采取了双轨策略,^③除开展反土耳其活动之外,还要求组织成员积极参与叙利亚政治生活。这对伊拉克、土耳其等周边国家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霍伊布联盟对1927年阿拉特山库尔德武装暴动的支持,也是其扩大影响力的重要体现。它也被认为是“库尔德军队的总指挥部”^④。这主要源于霍伊布联盟不仅对来自库尔德地区的部落人员进行游击战术培训,而且直接参与了1927年库尔德人反对土耳其的武装暴动。从一定意义上讲,1927年至1932年间霍伊布联盟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反对土耳其这一目标而实施的。霍伊布联盟建立不久就任命伊赫桑·努里帕夏组织库尔德武装开展对土耳其政府的军事行动,并于1928年建立了阿拉特山库尔德共和国。^⑤1930年,阿拉特山库尔德共和国被土耳其军队覆

①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②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17.

③ Hamit Bozarslan, Cengiz Gunes and Veli Yadirgi,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Kur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438.

④ Abbas Vali, ed.,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p. 199.

⑤ Wadie Jwaideh,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211-212.

灭,导致大量的库尔德领导人开始逃亡伊朗。^①

尽管阿拉特山暴动失败了,但是霍伊布联盟对随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话语建构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霍伊布联盟的宣传也认为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社团在库尔德部落中进行的首次动员,并试图建立一个超级部落军事组织,以增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潜力。实际上,1927 年阿拉特山暴动前,霍伊布联盟的影响力远远胜过传统部落对库尔德民众的影响。尤其是霍伊布联盟宣传的“新游击战”思想吸引了大量库尔德民众加入反对土耳其政府的阵营。^②此外,霍伊布联盟领导的这次武装暴动也表明,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已经将视野投向周边国家伊拉克、伊朗的库尔德地区,从而使得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具有了跨国性特点。^③

三、贝迪尔汗兄弟与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

1930 年阿拉特山库尔德暴动的失败警醒了更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也促使他们进行了更多反思。部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认为,面对强大的土耳其政府军,库尔德人的武装斗争终将徒劳无益。所有库尔德暴动失败的事件已经表明,如果没有一个大国的支持,仅靠零散的行动反对土耳其是毫无意义的。而一些库尔德文化精英则认为,民族主义运动面临极大困难,但可以通过恢复使用库尔德语、推广库尔德语言教育和文学来加强库尔德人社团的民族认同感,进一步凝聚民族意识。这导致了霍伊布联盟中部分成员主动放弃武装斗争,转而选择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新形式。^④加之法国殖民当局鼓励少数民族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很快叙利亚就成为了库尔德文化运动的新中心。^⑤在这场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中,贾拉达特·贝迪尔汗与卡姆兰·贝迪尔汗兄弟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⑥

① Abbas Vali, ed.,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p. 199.

② Ahmet Serdar Akturk, *Imagining Kurdish Identity in Mandatory Syria: Finding a Nation in Exile*, p. 67.

③ 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4-345 页。

④ Michael M. Gunter, *Out of Nowhere: The Kurds of Syria in Peace and War*, p. 12.

⑤ Ahmet Serdar Akturk, *Imagining Kurdish Identity in Mandatory Syria: Finding a Nation in Exile*, p. 72.

⑥ Cengiz Gunes, *The Kurds in a New Middle East: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a Regional Conflict*,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63.

（一）编辑出版《哈瓦尔》

亨廷顿认为，“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① 拥有和熟悉本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是库尔德人塑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前提。库尔德文化精英希望通过增加库尔德民族认同意识，摆脱碎片化的族群现状。1932年，霍伊布联盟一些成员计划成立一个库尔德人道主义与慈善社团，帮助贾兹拉的库尔德贫民改善生存环境。^② 该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推动国外库尔德青年的语言教育和编辑库尔德语出版物。

尽管该组织最终没有建立起来，但是贾拉达特·贝迪尔汗担任主编的《哈瓦尔》(*Hawar*)的创刊实现了其以库尔德语刊物传播库尔德语言、历史与文化的预期目标。^③ 《哈瓦尔》的出版周期并不固定，一般为每月2期，有时每月1期。《哈瓦尔》办刊宗旨主要是为了宣传库尔德文化，塑造民族认同，包括七个具体目标：一是传播库尔德字母表；二是分类和出版库尔德语语法；三是对库尔德语不同方言进行比较研究；四是出版库尔德经典和民间传说；五是界定传统库尔德音乐的特点；六是出版关于库尔德人传统和习俗的民族志研究成果；七是发表关于库尔德斯坦历史和地理研究的成果。^④ 在实际办刊过程中，《哈瓦尔》开设各种主题专栏，刊登了大量库尔德散文、诗歌、戏剧、音乐以及库尔德历史、民族志的研究成果。在《哈瓦尔》的影响下，一些与霍伊布联盟联系密切的库尔德部落领导人也开始加入贝迪尔汗兄弟推动的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1933年，赫维坎(*Heverkan*)部落最具影响力的哈吉(*Hajo*)阿迦在《哈瓦尔》上撰文《谢赫、阿迦和知识分子》，呼吁解决传统部落的内部争论，在库尔德地区大力推广库尔德语。^⑤ 在哈吉的号召下，一些私立宗教学校开始在贾兹拉纷纷建立，以库尔德语讲授宗教知识和经典库尔德文学。^⑥ 1942年，贾拉达特·贝迪尔汗为《哈瓦尔》建立了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② Abbas Vali, ed.,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p. 207.

③ “哈瓦尔”意为“号召”、“呼喊”。该期刊出版一年后，贝迪尔汗兄弟与编辑部人员为一些小学编写了教科书小册子。1937年，因大马士革阿拉伯主义者反对，法国当局中止了《哈瓦尔》期刊出版工作（教科书出版仍在继续），直到1943年复刊。在期刊出版过程中，法国当局也曾给予贾拉达特·贝迪尔汗一些小额补助。参见 Amir Hassanpour,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in Kurdistan, 1918-1985*, San Francisco: 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25-230.

④ Jordi Tejel Gorgas, “The Kurdish Cultural Movement in Mandatory Syria and Lebanon: An Unfinished Project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1932-46,” p. 849.

⑤ Abbas Vali, ed.,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pp. 208-209.

⑥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 454.

名为《光明》(Ronahî)的副刊。至 1945 年停刊前,《光明》共出版了 28 期。^①

《哈瓦尔》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调库尔德文化遗产、语言和教育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整个库尔德民族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它不仅影响了整个库尔德斯坦地区,而且开启了叙利亚库尔德社团内部不同阶层的对话交流,实现了库尔德名人与精英知识分子、城市库尔德人与部落精英之间的积极互动。^②以贝迪尔汗兄弟为代表的杂志创办者认为,认同、共享库尔德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可以结束部落领导人与城市知识精英之间围绕库尔德传统的论争,而且为有效动员库尔德人开辟了新途径。

(二) 库尔德语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推广库尔德语和拉丁字母的使用是《哈瓦尔》办刊的主要目标之一。贾拉达特·贝迪尔汗曾在《光明》刊文写道:“我们知道我们的独立在于我们的语言,只有通过学习读写和保护我们的语言,我们才能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独立和自豪地生活。”^③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叙利亚官方数据,40 年代初叙利亚 8.5% 的人口说库曼吉方言。为了更好地推广库尔德语,《哈瓦尔》引入了拉丁字母的音译系统,此举被认为是库尔德语现代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尽管《哈瓦尔》以库曼吉方言为主,但是依然坚持发行法语版本。《哈瓦尔》的出版对于推进库尔德语言的标准化形成与规范使用产生了深远影响。^④

贝迪尔汗兄弟以《哈瓦尔》为基础,积极推进库尔德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一方面,他们以库曼吉口语为基础,通过引入拉丁字母的书写和语法来固定库尔德语言规范。贝迪尔汗兄弟成功完成了语言规范化发展中规范的选择和编纂前两个阶段。完成库尔德语标准化的过程中库尔德语言规范的拟订和库尔德民众的普遍接受两个阶段,需要满足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从政治条件来看,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的社会政治环境较为特殊。尽管贝迪尔汗兄弟创办了《哈瓦尔》,但是法国当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刊内部运作和期刊资源的支配。^⑤1933 年,法国当局允许库尔德人进入哈马(Hama)的军事学校学习,同时每年都为来

① Bilal Çelik, “Translation in the Kurdish Magazine Hawar: The Making and Legitimization of a Cultural Identity,”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 Vol. 14. No. 2, 2019, p. 287.

② Michael M. Gunter, *Out of Nowhere: The Kurds of Syria in Peace and War*, p. 12.

③ Jordi Tejel Gorgas, “The Kurdish Cultural Movement in Mandatory Syria and Lebanon: An Unfinished Project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1932–46,” p. 849.

④ Bilal Çelik, “Translation in the Kurdish Magazine Hawar: The Making and Legitimization of a Cultural Identity,” p. 284.

⑤ Abbas Vali, ed.,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p. 209.

自贾兹拉地区的库尔德人提供奖学金。法国当局还支持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高等教育研究所开设库尔德语课程,甚至为法国官员开设库尔德语课程。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对库尔德文化复兴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法国当局的目的旨在通过支持库尔德文化复兴来减少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激进活动,不是支持建立一个所谓自治或者独立的库尔德国家。^①

尽管法国当局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文化复兴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强调库尔德文化复兴的精神价值,但是此举引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1936年《法叙条约》签订后,法国驻叙利亚高级专员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批评表现出极端敏感。叙利亚的公共教育语言方案中只包括阿拉伯语、法语以及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地区的土耳其语,并不包括其他族群语言。就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并不想支持广泛使用库尔德语教学,原因在于此举不利于阿拉伯民族国家建构这一目标的推进。^② 在此背景下,委任统治当局不得不对库尔德语教育施加限制。库尔德文化复兴的推动者只能通过各种途径填补被压制的教育空间,比如在夜校、宗教学校里教授库尔德语和个人自学。^③

一种语言的成功标准化还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在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北方城镇并不被视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库尔德民众的严重贫困以及教育水平低下成为库尔德语标准化发展的主要障碍。贾兹拉的城市化进程无法掩盖大部分库尔德民众物质贫困的现实。部落中阿迦们对大农场的完全占有进一步加强了对库尔德民众的社会控制。医院和学校等公共服务几乎不存在。在此背景下,发展库尔德语显然不会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库尔德人的优先任务。^④

(三) 库尔德语广播与俱乐部的文化活动

1936年《法叙条约》签订后,委任统治当局一定程度上收紧了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策,但是并没影响库尔德语运动的进一步推进。1941年3月,卡姆兰·贝迪尔汗建立了自己的库尔德语广播电台,开始使用库尔德语广播,每周2次,每次30分钟,主要从贝鲁特向整个黎凡特地区广播新闻类节目。虽然广播时间

① Sebastian Maisel, *The Kurds: An Encyclopedia of Life, Culture, and Society*, p. 281.

② Jordi Tejel Gorgas, "The Kurdish Cultural Movement in Mandatory Syria and Lebanon: An Unfinished Project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1932-46," p. 853.

③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26.

④ 直到20世纪70年代,流亡欧洲的库尔德社团才在库尔德语完全标准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标准库尔德语的规范化和传播仅局限于欧洲流散的库尔德社团内部。在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中东国家,库尔德语标准化工作至今仍未完成。参见 Jordi Tejel Gorgas, "The Kurdish Cultural Movement in Mandatory Syria and Lebanon: An Unfinished Project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1932-46," pp. 853-854.

不长,但卡姆兰·贝迪尔汗用库曼吉方言播报的新闻传播到土耳其境内,有效扩大了库尔德语的区域性影响。^①

此外,叙利亚境内建立的一些青年库尔德俱乐部和宗教学校也是传播库尔德文化和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平台。在贾兹拉地区,1932 年库尔德慈善协会的 230 名会员向《哈瓦尔》捐款。^② 青年库尔德俱乐部成员不仅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地区出版各种讽刺漫画,而且共同建立了库尔德文化运动的表达方式。在大马士革,萨拉赫丁(Salah al-Din)俱乐部也仿照贾拉达特·贝迪尔汗的语言教育模式,开始组织库尔德语言协会,建立夜校并使用拉丁化的库尔德字母教授库尔德语。^③

四、部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贾兹拉的自治实践

部落民族主义是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典型特征。传统观点认为部落是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障碍,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④ 与之相反,整个委任统治时期,部落领导人不仅是传统部落利益的代表,更是现代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它本质上是传统部落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相互调和的产物。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受 1936 年《法叙条约》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叙利亚境内贾兹拉地区的库尔德人开启了以部落为基础的民族自治运动。

(一) 霍伊布联盟宣传与部落民族主义的兴起

霍伊布联盟的宣传以城市为基础,但也注重民族主义思想在部落的传播。霍伊布联盟领导人坚信在库尔德部落社会进行民族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城市中的民族主义宣传运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民族主义在库尔德农村部落地区的传播却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它不仅没有能够唤起更多库尔德部落去支持阿拉特山暴动,而且也没有动员其加入反对土耳其的行动中,其原因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叙利亚、伊拉克与土耳其之间的边界控制加强,阻止了部落成员在三国交界地带的自由流动;第二,霍伊布联盟的宣传话语主要集中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想而不是维护部落利益,并不能为所有库尔德部落领导人所支持;第三,霍伊布

^① Sebastian Maisel, *The Kurds: An Encyclopedia of Life, Culture, and Society*, pp. 280–281.

^② Michael M. Gunter, *Out of Nowhere: The Kurds of Syria in Peace and War*, p. 38.

^③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第 210 页。

^④ 参见[以]约瑟夫·科斯蒂纳:《部落社会中的国家:对 K. H 纳吉布海湾研究的思考》,载[以]乌兹·拉比主编:《变化的中东部部落与国家》,王方、王铁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81–282 页。

联盟强调建立一个集权的军事组织,开展库尔德武装运动并不符合库尔德部落领导人的利益,部落领导人不愿放弃在军事事务中的特权地位。^①

霍伊布联盟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由接受过西方自由思想的库尔德知识分子推动,并不容易被传统农村部落成员所理解。为进一步推动民族主义思想在农村的传播,霍伊布联盟必须考虑部落领导人与部落成员的利益,这为部落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在贾兹拉地区,霍伊布联盟的宣传主要由一些接受过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的部落阿迦们所推动。赫维坎部落的哈吉阿迦就是部落民族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1925年谢赫·赛义德暴动失败后,哈吉带领400多个部落家庭移民到贾兹拉。自1926年开始,哈吉不仅成为叙利亚法国驻军的重要支持者,不仅号召其他一些部落支持法国的委任统治,甚至还为法军补充兵员。1931年,哈吉获得了哈萨卡的永久居住权,组建了一支200人的部落武装。1936年,哈吉“半封建地主”的权威地位得以稳固,深刻影响了赫维坎部落的权力和组织结构。^②从个人经历来看,哈吉早年参加霍伊布联盟,后参与贝迪尔汗兄弟领导的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在1937年贾兹拉自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贾兹拉成立了库尔德自治俱乐部,并在哈萨卡自己的住所升起了库尔德国旗。^③

哈吉不仅是一位部落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从一定意义上讲,哈吉很好地调和了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哈吉必须积极宣传民族主义话语,倡导民族大义,反对狭隘的部落主义。而作为一个部落领导人,他又很好地维护了自身利益。尽管参与民族主义活动,哈吉依然是传统部落秩序的维护者。部落是其赖以维护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基础,也是实现个人权威的中心。哈吉通过参与民族主义活动提高自己在贾兹拉部落中的声誉,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哈吉的部落民族主义实践活动表明,非宗教的部落领导人更容易接受民族主义话语,更能与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抱负彼此兼容。

(二) 贾兹拉地区的库尔德自治实践

虽然霍伊布联盟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反对土耳其,但仍有一些部落首领和城市名人主张在叙利亚国家框架内实行地方自治。早在1924年5月,来自库尔德山的努里·康蒂(Nouri Kandy)向法国当局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所有地区实行政治自治。^④巴拉兹联盟(Barazi Confederation)的首领穆罕默德·沙欣(Muhammad Shahin)和博赞(Bozan)也递交了支持库尔德自治的

① Abbas Vali, ed.,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p. 202.

②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 457.

③ Sebastian Maisel, *The Kurds: An Encyclopedia of Life, Culture, and Society*, p. 281.

④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第209页。

请愿书。在第三份请愿书中,穆斯塔法·沙欣(Mustafa Shahin)向法国当局呼吁以居住在贾拉布卢斯和努塞宾(Nusaybin)之间的所有库尔德部落为中心,建立一个库尔德国家。这个国家既可以作为对抗土耳其的缓冲,同时也可以遏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野心。这三份请愿书都希望法国成为库尔德人自治的支持者,而不是仅仅希望获得对库尔德人有利的特定文化或政治权利。^①

霍伊布联盟成立后,库尔德人请愿要求的政治性质发生了变化。1928年8月,霍伊布联盟根据《委任统治宪章》和委任统治中有关地方自治的规定,向法国当局提交了一份地方自治的备忘录。库尔德人在备忘录中提出几点要求:在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的学校引入库尔德语教学;用库尔德人取代该地区所有行政人员;组建一支库尔德骑兵专门负责保卫北部边境;法国在哈萨卡安置库尔德难民,后者将在那里从事农牧业。^② 作为补偿,请愿者将承诺支持法国当局的政策,并鼓励库尔德人加入法国军队。库尔德学者麦克道威尔认为这是叙利亚库尔德民族意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表达。^③ 然而,法国担心支持库尔德人的诉求可能会引发叙利亚民族主义者或土耳其的抗议,最终拒绝了请愿书。

与法国当局政策不同,一些法国军官在贾兹拉地区却推出了相反的政策。最早提出在贾兹拉建立自治的是法国军官皮埃尔·特里耶(Pierre Terrier)。1924年至1927年,特里耶驻扎在贾兹拉,专门负责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与法国的关系问题。特里耶不但充分认识到库尔德难民对贾兹拉地区发展以及在土叙边界争端中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且与一些库尔德部落领袖建立了密切联系。考虑到三个库尔德飞地都倾向于自治的要求,他认为创建一个包括所有三个地区的自治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议库尔德领导人集中精力于贾兹拉,但可以在库尔德山和贾拉布卢斯满足库尔德人的一些特权要求。^④

1936年至1939年间,库尔德人和基督徒联合发起的自治运动在贾兹拉出现。^⑤ 联合自治运动一定程度上也是皮埃尔·特里耶计划影响的结果。这场运

^① Jordi Tejel Gorgas, "The Terrier Pla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Kurdish Policy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 in Syria, 1926-1936," p. 99.

^②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28.

^③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p. 453-454.

^④ Jordi Tejel Gorgas, "The Terrier Pla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Kurdish Policy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 in Syria, 1926-1936," pp. 100-101.

^⑤ 这场库尔德自治运动由哈吉阿迦、卡德乌尔贝伊(Kaddur Bey)和哈利勒·本·易卜拉欣帕夏等共同领导发起。哈吉作为贾兹拉的库尔德部落代表与基督教名人维持联盟。1938年,他还曾担任贾兹拉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起草临时地区法规。参见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227页。

动的核心诉求包括获得与阿拉维派、德鲁兹派或亚历山大勒塔的桑贾克派同等的自治地位,任命一位对国际联盟负责的法国总督。^① 在文化和行政方面,库尔德人则要求在学校推广库尔德语,聘用库尔德官员。自治主义者通过签署请愿书并将其送交法国政府和国际联盟,并通过组织公众抗议、关闭集市以及建立身份标志等方式,寻求这些目标的实现。作为交换,库尔德人也同意成为叙利亚公民,承诺将为国家的经济做出贡献,并将竭尽全力保卫叙利亚边境。

从本质上来说,这场自治运动是叙利亚境内以库尔德人与基督徒为代表的少数派对1936年《法叙条约》的一种回应。^② 根据《法叙条约》,赢得1936年议会选举的民族集团将在1939年之前主导叙利亚政治。民族集团为巩固叙利亚国家的阿拉伯属性对自治主义者采取敌视政策。最终,在法国的压力下,民族集团才承认自治联盟在贾兹拉的选举结果。为施压自治联盟,1937年初叙利亚政府甚至在哈萨卡任命了新省长,解雇了支持贾兹拉自治的官员,鼓励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的农民在此定居,以提高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居住比例。^③

1937年7月5日,叙利亚警方在逮捕一名独立运动领袖时引发了武装冲突,导致叙利亚官员纷纷出逃。自治联盟很快在贾兹拉建立了一个地方行政机构。8月,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决定采取行动对阿穆达(Amuda)的基督徒进行报复。在泛伊斯兰主义的号召下,一些库尔德部落也参与了对阿穆达基督徒的攻击,导致24人死亡。^④ 该事件加剧了库尔德人和基督徒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1938年,法国军官对基督教名人施加压力,要求其不再支持贾兹拉的自治要求,导致自治派基督徒进一步陷入孤立。1939年2月,大马士革政府辞职后,贾兹拉很快被置于法国的直接统治之下。^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宣布反对任何形式的库尔德自治,并成为同盟国重要伙伴。土耳其对其境内的库尔德人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1943年7月,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和民族集团再次赢得议会选举。新政府要求法国立即放弃委任统治。在法国人撤离之前,基督教名人在立场上逐渐偏向大马士革政府。而库尔德人在整个自治运动中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库尔德人希望在贾兹拉建立一个大国或者国际保护下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与大马士革政府公开对抗。他们认为,如果库尔

①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30.

② Abbas Vali, ed.,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p. 212.

③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 458.

④ Wadie Jwaideh,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 146.

⑤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 458.

德人在二战后被迫留在叙利亚的话,制造一场冲突后果难以预料。^① 1945 年春,贾兹拉的库尔德代表向时任叙利亚总统库阿特里(Shu al-Quwwatli)提出要求,表达贾兹拉库尔德人的不满情绪。尽管叙利亚政府做出承诺,但是直至 1946 年叙利亚独立,贾兹拉依然没有获得自治地位,库尔德人与基督徒少数派的权益也没有得到保证。这场由库尔德人与基督徒共同发起的自治运动也宣告失败。

库尔德专家伊娃·斯维德贝格(Eva Savelsberg)认为,“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不同,这场库尔德与基督徒联合发起的自治运动主要是为库尔德人和基督徒群体争取权利,却从未要求与叙利亚分离出来,更无法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取向。大多数库尔德自治主义者感觉与土耳其库尔德人更亲近,而不是大马士革新中央政府。20 世纪 30 年代的事态发展与 2004 年或 2011 年以来的发展非常相似。然而,20 世纪 30 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主导意识形态,提供给少数民族权利的机会微乎其微。”^②

五、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根源

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兴起与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从一个碎片化的族群逐渐成长为拥有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族群,为推动民族自治而持续努力。从表面来看,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民族运动经历的这种变化与法国的委任统治政策密切相关。从深层次来看,叙利亚库尔德民主主义运动的兴起与演变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所导致的。

第一,战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一战结束后,伴随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进入了新一轮变动期。英、法乘机在中东先后建立了委任统治制度。法国根据 1916 年《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 1920 年《圣雷莫决议》确立了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然而,一战后叙利亚政局混乱且面临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多重挑战。为更好维护统治秩序,法国当局实行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以应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挑战。在法国占领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后,对早期库尔德人的自治诉求予以拒绝。相反,法国当局却对叙利亚境内土耳其的库尔德移民施行宽容政策,默许和支持霍伊布联盟及其推动的民族主义宣传

^①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36–37.

^②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ed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ran, Iraq, and Syria*, p. 90.

与文化活动。1932年,伊拉克的完全独立使得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脱离法国委任统治的热情高涨。1936年《法叙条约》签订后,法国当局进一步收紧了对库尔德人的政策,但此举进一步激化了库尔德人与法国当局的关系。来自库尔德山的易卜拉欣·哈利勒(Ibrahim Khalil)直接领导了1936年反对法国委任统治的穆鲁德(Murud)运动。^①1937年库尔德人和基督徒联合发起的贾兹拉自治运动也是对法国委任统治政策调整的回应,但遭到当局镇压。二战爆发至1946年最终撤出叙利亚,法国都没有改变不支持库尔德自治的政策立场。法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策变化本质上是对一战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调适,根本目的是维护法国在叙利亚境内的殖民统治利益。

第二,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传播。在伍德罗·威尔逊“民族自决权”的影响下,一战后中东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除阿拉伯民族主义占据了时代主流外,以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以及亚述人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纷纷掀起本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其特殊性——它并非原生的本土民族主义。相反,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诞生与土耳其库尔德民族运动有着密切联系。^②换言之,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土耳其国家民族主义扩张的直接反应。1925年后流亡叙利亚的土耳其库尔德难民是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发起者与传播者。霍伊布联盟的建立及其民族主义实践更是旨在唤醒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推向新的高潮。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库尔德精英知识分子、库尔德名人以及部落领导人都积极参与这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实现了部落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开启了库尔德部落民族主义运动的新阶段。

第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影响。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难以脱离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③20世纪20年代中期,叙利亚曾一度成为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1921年至1925年间,约55,000名亚美尼亚人离开土耳其前往叙利亚。在阿勒颇,亚美尼亚人组建的塔契纳克党(Tachnak Party)不但积极推动了霍伊布联盟的构建,而且为后者的民族主义实践提供了大量政治、经济和后勤上的支持。阿勒颇一度成为塔契纳克党与霍伊布联盟共同的民族主义活动中心。1927年10月,塔契纳克党和霍伊布联盟在贝鲁特签署合

^①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 455.

^② Wadie Jwaideh,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 143.

^③ AIR 23/412, Major W. A. K. Fraser to Director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War Office, October 15, 1927, No. 2/11, 转引自 Anita L. P. Burdett, ed., *Records of the Kurds: Territory, Revolt and Nationalism, 1831-1979, Volume 7: 1927-1930*, pp. 53-55.

作协议,共同反对土耳其政府。^① 根据该协议,双方将各自承认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独立的权利,而两国之间的边界划分将根据一战前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人数以及《色佛尔条约》所确立的种族和司法原则来决定。^② 从文化层面来看,贝迪尔汗兄弟周围的一小群知识分子也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中获得灵感,发起了一场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为拉近两大族群的关系,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甚至试图构建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人拥有共同民族起源的神话。霍伊布联盟也曾一度为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联盟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可以说,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在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至深至远。^③

第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法国当局的政治博弈。一战后法国当局认为所谓叙利亚的独立与统一不过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物,是英国人人为创造出来的,旨在损害法国在中东的利益。^④ 为孤立阿拉伯民族主义,法国当局对德鲁兹派、阿拉维派和基督徒的支持实际上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制衡。在叙利亚族际政治发展过程中,库尔德人扮演了重要角色。整个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库尔德民族独立意识的日益增强,引起了阿拉伯政治精英的极大怀疑和敌视。^⑤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普遍认为库尔德人是推进叙利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障碍。库尔德问题研究专家克里姆·伊尔迪兹(Kerim Yildiz)认为整个委任统治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公开立场是对立和冲突的。^⑥

事实上,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法国当局的政治博弈从不同层面影响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委任统治初期,为制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法国当局有意采取了扶持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策,甚至支持其自治。而一旦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超越委任统治政府的掌控能力,法国当局则会收缩对库尔德人的政策空间。可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法国当局的博弈也是影响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① CO 730/133/6, Sir Lancelot Oliphant,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February 29, 1928, No. E885/125/65, 转引自 Anita L. P. Burdett, ed., *Records of the Kurds: Territory, Revolt and Nationalism, 1831-1979, Volume 7: 1927-1930*, p. 98。

②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第 209 页。

③ 关于叙利亚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人的联盟情况,参见 Ramazan Öztan and Alp Yenen, eds., *Age of Rogues: Rebels, Revolutionaries and Racketeers at the Frontiers of Empir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355-382。

④ 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Syria: The Forgotten People*, p. 27。

⑤ FO371/52874, From Beirut Chancery to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Despatch No. 50/18/46, April 19, 1946, 转引自 B. Destani, ed.,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Christian Minorities, Part II, 1915-1958*,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 2007, p. 500。

⑥ 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Syria: The Forgotten People*, pp. 29-30。

六、结语

整个委任统治时期,尽管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发起的自治运动以失败告终,库尔德人的民族权益也没有获得切实保障,但是这场民族主义运动本身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对库尔德人来说,这场运动培育了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促进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觉醒,为现代库尔德民族政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早期在贾兹拉的自治实践也为2014年以来叙利亚贾兹拉库尔德自治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警示与教训。

第二,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法国的委任统治制度,客观上配合并推进了叙利亚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无论是阿穆德的反法运动还是库尔德人和基督徒联合自治运动都影响了与法国当局的关系,挑战了后者的委任统治秩序。尽管库尔德人提出了自治诉求,但并没有提出民族分离主义主张,依然坚持在叙利亚国家统一的框架内进行,这对现代叙利亚民族国家的构建是有积极推进意义的。伊斯梅特·谢里夫·瓦利(Ismet Chériff Vanly)认为,“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运动过程中,库尔德人的作用不容忽视”^①。

第三,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实现,而且引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敌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不但严重激化了库尔德人自身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关系,而且为二战后叙利亚政府排斥库尔德人,推行其“阿拉伯化”政策埋下了重要隐患。

第四,这场运动涉及到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以及英国、法国、苏联等多国的互动关系,这不但加剧了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复杂性,而且深刻影响了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成为现代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重要历史源头。

(责任编辑:包澄章 责任校对:章远)

^① Philip G. Kreyenbroek and Stefan Sperl, eds., *The Kurds: A Contemporary Overview*,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117.